

江淮英烈傳

JIANGHUAI YINGLIEZHUAN

第1辑

主编：萧志远 安徽人民出版社

英名垂青史
光輝照后人

徐向前題
一九八四年五月

浩气贯日月，英名照江淮。

程子华 -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江淮英烈的光辉形象
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
心中。

郭述申
一九八四年四月於北京

编辑说明

一、本书名为《江淮英烈传》，以刊载辛亥革命以来至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而英勇献身的安徽省籍革命烈士传略为主，同时也刊载对安徽革命斗争作出重大贡献或牺牲在安徽土地上的外省籍知名烈士传略。

二、本书旨意在于弘扬先烈精神，启迪教育后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烈士的高尚品质和英雄业绩永垂史册；同时为党史和革命史研究以及地方志、文史、文物、档案编纂和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参考资料。

三、本书所载烈士传略，不分时期、地域、职务，仅视资料多少编纂成辑；每辑内的传略一般按烈士牺牲时间顺序编排；对于同一事件、同一战役牺牲的烈士，视研究、学习、查阅资料的需要安排先后；也可集中编排专辑。

四、本书所载传略要求以叙述为主，尽可能地全面反映烈士一生的斗争事迹和精神风貌；对烈士的活动细节和在历史中的功绩，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

五、本书所载各篇传略，引用的有关材料，或在文中“（ ）”内说明，或在文末注释中标出。编者如认为有可疑字义或史实疑点，或在文中加“（？）”以示存疑，或在注释中指出。

六、本书中有个别烈士传略转载于其他书刊，转载时在篇末注明原书刊名称、期数。

七、本书在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省内外党政军机关、群众团体、高等院校、烈士的亲属以及许多老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细致，加之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烈士的战友、亲属，老同志，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各有关方面读者批评指正。

《江淮英烈传》编辑部

1990年8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用烈士精神教育后代

——写在《江淮英烈传》出版之前 张恺帆(1)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烈士 孙其明(1)

杰出的组织工作者陈乔年烈士 孙其明(14)

王影怀烈士传略 王秉初 王化东(25)

魏野畴烈士传略 子君(30)

詹谷堂烈士传略 倪方六(37)

刘淠西烈士传略 莫非(43)

杰出的红军将领许继慎 鲍劲夫(52)

六安河西暴动的领导者

——毛正初烈士传记 鲍劲夫 叶森(65)

周味韶烈士传略 范先荣(76)

胡祥仁烈士传略 方罗来(82)

赵连轩烈士传略 唐钟义(88)

陈原道烈士传略 尔宜(93)

吴振鹏烈士传略 郭必强(101)

刘伯林烈士传略 周广庭 鲍成森(108)

吴保才烈士传略 苏建中(119)

长留正气在人间

- 记凌霄烈士战斗的一生 叶长庆 程丽华(126)
欧阳斌烈士传略 盛敏学(134)
江上青烈士传略 周 邦 江蛰君(139)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池 平(148)
项英传略 宋 霖(155)
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 黄开沅(170)
林英坚烈士传略 池跃华 吴新南(180)
支队司令员张正坤 黄开沅(183)
孙太然烈士传略 铜陵县民政局(190)
谢葵烈士传略 刘士洪(193)
吕惠生烈士传略 周 葱(200)
- “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 叶挺将军传记 童志强(210)
虎将皮定均 台运行(222)
一等功臣梁岭烈士生平事迹 王贵卿 蒋庆彬(235)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烈士

孙其明

在黄埔江畔的龙华塔下，长眠着一位安徽籍的著名烈士，他就是大革命时期闻名广东的共产党员陈延年烈士。

挣脱封建家庭的樊笼

陈延年，又名遐延，怀宁县人，1898年出生在安庆城里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祖父陈衍中，以教书为生，1881年病逝。叔祖父陈衍庶，清末举人，曾在奉天（现辽宁省）任县州官职。父亲陈独秀，为陈昔凡嗣子，年轻时受西方民主主义影响，背叛封建家庭，从事革命。母亲高晓岚，生子女5人，陈延年居长，其妹陈玉莹次之，三弟陈乔年，四妹幼殇，五弟陈松年。陈氏家族原先贫寒，从怀宁乡下迁至安庆城内后，家境逐渐富裕，成为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

陈家世代书香，对子弟要求极严，陈延年五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十二三岁起，先后就读于安庆尚志小学和金皖中学。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记忆力极强，师友们常夸他“过目成诵”，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处借书阅读。当时，陈家近邻有一位汪洋老先生，家中藏书甚多，陈延年常去汪家借书。经过几年，他读了大量的经史典籍，在国学方面有较好的基础，并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陈延年虽然嗜书成癖，但不是闭门读书。在读书之外，他还

经常向社会上一些有知识的人学习那些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据当时认识他的人回忆：安庆城里有座迎江寺，陈延年同迎江寺的和尚过往甚密，一有空，便到迎江寺与和尚谈天说地，评古论今。从和尚们那里，他知道许多生动有趣的事，增长了不少见识，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

陈延年在安庆读书期间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从历史和现实中，他一方面为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班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擒敌雪耻的爱国行为所感动；一方面也为那些挂着英国旗和日本旗的轮船在长江上通行无阻的侵略行径感到愤慨。加以他父亲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他渴望改变国弱民贫的现状，把中华民族从专制统治和列强宰割的双重苦难中解救出来，这就使他在思想上开始萌发革命的反叛性。祖母和母亲盼望他读书成名，继承祖业，但他决心挣脱封建家庭的樊笼，寻找改革社会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袁世凯阴谋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号召举行二次革命，陈独秀帮助都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举兵讨袁。不久，讨袁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攻占安庆，下令通缉柏文蔚和陈独秀，柏、陈被追亡命日本。倪嗣冲又派人到陈家搜捕，扬言要斩草除根。幸好陈延年兄弟事先得到消息，走避乡间，才免遭毒手。经过这场风波，陈延年对封建军阀的残暴有了切身感受，对他以后寻求真理也是一个推动因素。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不久，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随父到上海继续求学。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陈延年和陈乔年仍留在上海读书。起初，陈延年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专攻法文，两年后考入复旦大学。

在上海求学期间，尤其是父亲赴京以后，陈延年兄弟的生活

极为艰苦。父亲临行时，曾委托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付10元，作他们兄弟的生活费。这点钱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因此，他们便一边读书，一边做工自给。当时，他们在安庆的老家尽管几遭劫难，但供他们上学还是有力量的。然而，他们却不愿依赖封建家庭，拒绝家里对他们的供养。

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陈延年在上海读书期间，新文化运动正逐渐在全国兴起，他很快被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所吸引。他怀着探求真理的迫切愿望，浏览了所能找到的各种新书刊，而读得最多的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翻译的《天义报》、《新世纪》一类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他的法文较好，所以还直接阅读如《巴枯宁全集》和克鲁勃特金的《互助论》一类法文版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陈延年十分憎恨旧社会，有志于创立新世界，因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特别崇信《互助论》一书中阐述的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把它当作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基于这一信仰，他先后结识了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人。1919年1月，陈延年和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进化社，创办《进化》杂志，陈延年任主编。在《进化》杂志上，陈延年一方面推崇无政府主义学说，驳斥各种批评无政府主义的议论；另一方面则对协约国一伙帝国主义强盗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尖锐的抨击，号召人民起来“拿一副极坚强的奋斗精神”反抗“恶社会”。他还经常撰文斥责某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党人，以“主义”为幌子，实则谋官发财的可耻行径。1919年5月，《进化》杂志仅出了3期，便被军阀政府查禁。



同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起，在父亲的支持下，陈延年怀着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继续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12月下旬，他和陈乔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于次年2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2月3日到达法国首都巴黎。

到巴黎后，陈延年进入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维斯学校学习，他计划用半年或1年的时间修完该校规定的课程，然后报考巴黎大学。不料，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此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再予以资助，使他无法筹集学费以继续在巴黎的学业。此后，他时而到里昂寻找机会做工，时而回巴黎抓紧时间自学，处境极为艰难。

陈延年初到法国，仍然信仰无政府主义。经过对法国社会的接触，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同时也看出无政府主义并不能革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因而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进行比较，特别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受到很大的启发，终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这个研究之上。”这是他走了一段弯路以后获得的新认识。

然而，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还是实际斗争对他的启示。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等人领导下，发动了“一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三次斗争。在这三次斗争中，陈延年亲眼看到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人，不但不支持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行动；反而勾结法国当局对他们加以迫害。这对曾经崇拜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陈延年来说，是一个极为深刻的

教育，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于是，他和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站在一起，同吴稚晖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决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在他抛弃无政府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他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周恩来、赵世炎等对陈延年追求真理，抛弃谬误，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十分敬佩。

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出版《少年》月刊。同年秋，经法国共产党员阮爱国（胡志明）介绍，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萧三（萧子璋）等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正式承认参加法共人员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被选为支部领导成员。

192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旅欧支部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赴苏联学习。3月18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行，在周恩来的伴送下离开巴黎，途经比利时、德国，于4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陈延年到莫斯科后，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不懂俄语，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不断克服困难，深入研究。据当时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志回忆：陈延年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问题时，总是踊跃发言，阐明自己的见解。为了弄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他常常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习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同学们都佩服他的精神，称誉他为“小列宁”。

1924年夏，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急需大批干部，党中央决定分批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7、8月间，陈延

年与部分旅俄同志离开莫斯科，取道海参崴回国。9月下旬，他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旋即奉命去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

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4年10月上旬，陈延年抵达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共青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指导粤区团委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协议，派原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调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日常事务。1925年春，周恩来随黄埔学生军参加第一次东征，不再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仍兼区委军事部长），中央乃正式任命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接替周恩来主持区委工作。

陈延年到职后，首先成立由他和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邓中夏等人组成的主席团（即常委会），作为处理区委的日常事务机构。不久又先后设立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等机构，并在广州文明路租了一幢楼，作区委机关的办公地点。

在加强区委领导机关建设的同时，陈延年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党的建设。他认为：“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因此，他多次在区委有关会议上提出，要在实际斗争中物色发展对象，将真正经得起考验的、阶级觉悟高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吸收到共产党内来，以壮大共产党的队伍。他除了深入工厂、农村和学校，亲自考察和介绍一些先进分子入党，组建党的支部外，还派人分赴广东各地以及香港、广西和福建南部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区委的努力，在广东的汕头、琼崖、北江、西江等地先后建立了中共汕头地委、琼崖地委、北江地委、西江地委。

及其所属各县县委。此外，还组建了中共香港支部及广西的中共梧州地委、福建的中共闽南特委等。到1926年底，广东地区的中共党员从原有的数百人跃增至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38%左右，初步改变了党组织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状况。陈延年因此被大家誉为广东党的“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用群众运动促进革命高潮

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是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期间最突出的贡献。

陈延年初到广东时，不会讲广东话，接近群众有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经常深入到工农中，向他们学广东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多次同人力车工人一起拉车。当时香港《工商日报》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干部竟然去当车夫。陈延年看到后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工人们得知他曾到法国、苏联留学，竟不敢相信。他们说，陈延年根本不象出过洋留过学的洋学生，倒象一个道地的苦力。陈延年朴实的作风，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经过陈延年和区委工人部的努力，广东的工会组织迅速扩大，会员人数急剧增加。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上，1925年6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而发动的。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消息传到广州后，激起广州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陈延年主持召开中共广东区委会议，决定派邓中夏、杨殷等人去香港，冯菊坡、刘尔崧、周文雍等人去沙面和东山，分头

发动工人，秘密建立罢工领导机构。经过充分准备，6月19日，香港和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工人开始举行大罢工。同时，香港的罢工工人冲破英殖民当局的阻拦，离开香港回到省城。

在省港大罢工开始以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州工人、士兵、学生、郊区农民及返回省城的香港罢工工人10万多人，于6月23日举行抗议英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集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英租界对岸的沙基一带时，突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疯狂屠杀，造成惨不忍睹的“沙基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东工人和市民更大的愤怒。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省港大罢工进一步扩大。截止6月29日，罢工人数达25万。罢工工人成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使香港的经济陷于瘫痪。

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公开的罢工委员会内建立秘密的党团特别委员会，由邓中夏任党团特别委员会书记，李森任副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罢工中一切重大决策，均经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商量或召开区委会议作出决议，再通过特别委员会贯彻实施。

省港大罢工共坚持16个月，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涨。1926年10月10日，罢工胜利结束。同日，在陈延年主持下，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的历史功绩和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陈延年积极支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尽管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抽出时间担任农讲所的兼职教员，并多次为农讲所学员作报告。农讲所学员结业后，中共广东区委及时将他们派往各地农村，担负领导农民运动的重任。

工农运动的不断高涨，带动了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广东各界群众的斗争汇成一股巨流，猛烈冲击帝国主

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陈延年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为大革命时期广东群众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陈延年十分注意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他常对周围的同志讲：“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处于帮助地位，只能充当革命的苦力的错误观点，他曾严肃而气愤地说：“‘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前夕，陈延年同周恩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决定在会上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其右派势力，并计划在大会上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及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党籍，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选举中确保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地位。陈延年将上述计划报请上海党中央批复。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占绝对多数，实现这一计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不但不赞成他们的主张，而且在上海与孙科等大谈判，向右派妥协。同时，派张国焘到广州担任共产党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的党组书记，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执监委选举中作出让步。陈延年对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国民党二大以后，陈延年又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中央抛弃退让政策，改取向右派进攻的方针，但陈独秀、张国焘再一次拒绝了他的正确意见。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就在